

南开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

南开史学

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编 者 的 话

《南开史学》经过三年的试刊（内部发行，共六期），赢得了各地史学工作者和南开校友的信任和支持，从本期起公开出版发行。值此之际，我们谨向关心和支持过本刊的同志和单位敬致谢忱。

本刊是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办的学术性刊物。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学术民主，刊载不同学术流派、不同见解和不同风格的中外历史研究、史学理论、史事考释、史学评论等方面的学术文章；并辟有“古籍整理”、“研究生毕业论文选”，以及“史料”和“译文选登”等项栏目。我们希望通过本刊交流学术研究成果，促进学术讨论的开展，为发展、繁荣历史科学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贡献力量。

本刊公开出版，为本系师生、南开校友和各地史学工作者开辟了一块史学研究的新园地。我们愿意和大家一道辛勤耕耘，让祖国的史学园地开放出更多绚丽的花朵。

本刊每年两期，每期约二十万言。敬请同志们惠赐大作，以光篇幅。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和缺乏编辑经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多赐教正。

《南开史学》编辑部

一九八三年六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元代的阿儿浑人·····	杨志玖 (1)
鸦片战争前的地主与农民·····	来新夏 焦静宜 (12)

当※代※史※学※家※资※料

忆郑天挺先生·····	梁漱溟 蔡尚思 缪 钺 杨向奎 任继愈 何兹全 傅振伦 王玉哲 罗继祖 成庆华 程溯洛 钟文典 欧阳琛····· (26)
-------------	--

关于内战后美国南部农业发展道路问题·····	冯承柏 (63)
土地问题与农业资本主义化 ——评我国史学界流行的某些观点·····	张伟伟 (86)
改造美国历史	

〔美国〕卡尔·N、德格勒·····	纪 琨 译 (107)
-------------------	---------------

明初军制初探·····	南炳文 (138)
满洲政权早期前四旗考·····	白新良 (159)
黄宗羲思想及其《明夷待访录》析要	

·····	陈生玺 刘光胜 (177)
-------	-----------------

《太初历》是指《历术甲子篇》·····	刘洪涛 (196)
---------------------	-------------

评“大足教案”和“顺清灭洋”口号

·····	日本留学生铁山博 (204)
-------	------------------

浅谈党中央在红四军建设中的作用·····	左志远 (237)
----------------------	-------------

本刊征订启事·····	(203)
-------------	---------

稿约·····	(195)
---------	---------

《津图学刊》启事·····	(176)
---------------	---------

元代的阿儿浑人

杨志玖

一、元史上的阿儿浑及其方位

阿儿浑是元代色目人的一种。元末陶宗仪《辍耕录》中，列之为色目三十一种的第十三种。《元史》及元代其他文献中屡见其名，除称阿儿浑外，又有阿鲁浑、阿鲁温、阿剌温、阿儿温、阿鲁虎、合鲁温等名。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说：“阿鲁浑氏，亦称阿儿浑氏，亦称阿剌温氏、本西域部族。”虽大致不差，但语意笼统，既未说明此族的具体方位，也未指出她的其他特点。日人箭内互所著《元朝社会的三阶级（色目考）》一文，列举了本族在《元史》上的几种异名后说：

右阿鲁浑、阿鲁虎、阿鲁温、阿剌温，由其字面上及近邻诸部之关系察之，知为同一地名之对音，毫无可疑。然当比定今之何地乎？因记载不备，西史又无所见，不易臆测，恐即今之中央亚细亚之一部，在当时所谓回回及Sartaghul之内①。所言较钱氏深入，但仍未能确指其所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5《氏族表》说：

阿剌温氏（一作阿鲁浑，色目三十一种之第十三，《辍耕录》作阿儿浑），黑海东南侯国。北邻曲儿只，南与阿在儿拜展接壤，都城曰甘札，摩诃末教部族也。斡歌歹汗时内附，后属旭烈兀汗国。

屠氏说得具体明确，较箭内更进一步。但对他的正确性却不能不令人怀疑。其一，从屠氏所说的阿剌温的方位看，所指就是今天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Yerevan（今译埃里温）。Yerevan过去称为

Erivan或Irwan, 历史确很悠久, 但在元时, Erivan或Irwan的首字不可能译为“阿”字(今天也同样不能)。屠氏所以如此比定, 可能仅仅因为对音有点近似, 却不知这并不符合对音规律。至于屠氏说的甘札, 即Ganja或Gandzak、Gandzha, 今名 kirovabad (基洛瓦巴德, 即基洛夫城), 是苏联阿塞拜疆的一大都市, 也是个古老的城市, 但与阿儿浑并不相干。其二, 从《元史》中所举阿儿浑与其邻近部族的相对位置看, 阿儿浑只能象箭内互氏所推测的那样, 是畏吾儿邻近西域之地, 即今中亚细亚的一部, 而不会远在今伊朗西北部。因此屠氏所考, 表面似乎言之凿凿, 却经不起推敲。

同样, 俄国学者布莱慈奈德(Bretschneider)在其名著《中世纪研究》中, 认为阿鲁温可能是伊朗的乞尔曼沙(Kirmanshah)与巴格达(Bagdad)中间的Holvan城②, 也只是由于对音的近似而强为比附, 不足为据。

给阿儿浑一词以正确考订的是法国学人伯希和。伯氏在其《蒙古时代华北的一个回回人城市》一文中, 在引用《元史》卷122《哈散纳传》后说:

蒙古时代的中国载籍常言有此阿儿浑军。阿儿浑(Argun)是一部落名称, 必与十一世纪末年Kasgari所已识之Argu部落, 同现代的“黑姓乞儿吉思”(Kara—Kirghiz)之Argin或Argun族有关系③。

其后, 在《马可波罗游记铨释》第一卷50页中, 伯氏更进一步申述说:

同时, Arqun(阿儿浑)又为部落名。Kashqari把位于Talas(怛逻斯)与Balasaqun(八刺沙衮)一带的地区称为Arqun, 其书中提及此名达二十余次; 此名亦见于吐鲁番文书中。参看Brock Elmann, 10, 240); 察合台汗国中有阿儿浑(Arqun)部, 而Arqin(=Arqun)人又为乞儿吉思中帐(Kirghiz Middle—Horde)诸族之一(参看Radlov, I,

300, 302; ARISTOV, Zametki, 1903年引得, 5页)。按, 伯氏提及的Kashyari (通常作Kashghari) 指我国新疆维吾尔人马合木·喀什噶里 (意为喀什噶尔人马合木) 在十一世纪七十年代编辑的《突厥语词汇》, 我国学者张广达同志在《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 (突厥语辞汇, 与见于此书的园形地图 (上) 》一文对此书作过详尽的介绍。在该文中, 他引用了一段《词汇》的话说:

Arqu地区, 即包括从白水城到八刺沙衮在内的地区, 其居民的语言都有一定的柔性④。

白水城, 即阿拉伯语Isfijab, 唐时中国称其为白水城, 元时称为赛兰或塞蓝, 今苏联中亚之奇姆肯特 (Chimkent) 东十三英里地方⑤。八刺沙衮, 今苏联中亚托克玛克 (Tokmak) 以南约十五—十六公里处的布拉纳废城⑥。这样, 阿儿浑族所在的方位就明确了。张广达同志还为著者翻译了1939—1941年土耳其出版的阿塔莱伊 (B. Atalay) 刊原写本影印本76叶第9—10行的一段:

Arqu, 两山之间的空地 (峡谷)。因此位于怛罗斯 (T-araz, 即Talas) 直至八刺沙衮之间诸城亦称Arqu, 因为该地位于两山之间。

怛罗斯唐代已见其名, 元时称为塔刺寺或塔刺思, 一般认为今苏联中亚之江布尔 (Dzhambul) 城即是其地⑦, 但今地图江布尔东南约八十公里处尚有Talas城, 恐即其遗址。又, 十三世纪的札马儿·哈什 (Jamal Qarshi) 的《苏刺 (Surah) 字典补编》亦称Arqu国度为察合台国的主要居地。(巴托尔德《突厥斯坦》俄文版第一册“资料编”138页) 综合上引诸说, 则Arqu系泛指今苏联中亚七河 (Semirechye) 流域至楚河 (chu) 流域, 即吉尔吉斯共和国全部及哈萨克共和国一部地区及该地区的突厥部族, 应无疑义。

这里的Arqu是否元代的阿儿浑? 《元史》卷151《薛塔刺海传》可以为证。该传说:

薛塔刺海, 燕人也……从(太祖)征回回、河西、钦察、畏吾

儿、康里、乃蛮、阿鲁虎、忽缠、帖里麻、赛兰诸国，俱以炮立功。此处的阿鲁虎，自为Arqu的对音。其中提到的赛兰，也即Arqu所在地，已如上述。阿鲁虎加尾音N字，即为阿鲁浑；蒙古时代于一名词收声为元音者缀一N字，并不少见（同样，也有收声N字脱落者）。因此，伯希和迳以Kashghari书中之Arqu为Arqun，并不是错误，而元代称此民族之尾音多作浑或温也就不奇怪了。另外，巴托儿德曾引用西域史家的记载，提到一个属于突厥蛮（土库曼Turcoman）部的Arghun部落^⑧。这个Arghun无疑即是Arqu，也就是元代的阿儿浑或阿鲁浑。

二、阿儿浑与回回

阿尔浑人既然住在从怛罗斯到八刺沙衮一带地区内，这一地区自十世纪后半期即为哈拉或喀喇汗（黑韩）王朝的王廷（后地）和副王廷（前地）所在地，而哈拉汗王朝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因此阿儿浑人也应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此点在《元史》中似无迹可寻，但在元代其他载籍中却有不少印证。如许有壬《至正集》卷53《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说哈只哈心是阿鲁浑氏，西域人。哈只哈心(Hajji Hashim)生二子—阿合马(Ahmad)、阿散(Hasan)；阿散生二子—凯霖(Karim)及暗都刺(Abdullah)，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名，宋濂《宋学士文集》卷17（《壑坡集》第七）《西域浦氏定姓碑文》说浦君西域阿鲁温人，他的家族几代人中的名字如道吾、沙的、泰住丁、刺哲、马思护、罗里、赛鲁丁、木八刺、道刺沙、忻都等，都是穆斯林的名字。杨维桢《西湖竹枝集》载有诗人掌机沙（阿鲁温氏）的祖父名哈散，这是一个伊斯兰教徒经常称呼的名字。贡师泰《玩斋集》卷8《双孝传》说，亦福的哈儿丁，阿儿温氏。祖父叫扎马刺丁，儿子叫赡思丁、木八刺沙、哈散沙，说明这一家也是伊斯兰教家庭，

另外，元代的回回人，有不少人和阿儿浑族通婚。兹举《元统元

年进士录》为例：（仅录有关文字）

答漠沙 贯 ××答失 蛮氏 曾祖义失（夫）的暇儿丁
母阿鲁温氏 （注）方格内字原缺，据文意填，

阿都刺 贯中兴路录事司昔 马里回回人氏 曾祖答木
（术）丁 祖阿里 父洒不丁 母阿鲁温氏

□□□ 回回人氏 曾祖伯八刺里 祖马合谋 父哈里
丁 母阿鲁温氏

慕尙 贯大都路宛平县回回于闐人氏，见居杭州 曾祖迷
儿阿里 祖勘马刺丁 父哈八石 母阿鲁温氏

回回人是伊斯兰教徒，多与同教人结婚，此亦可证阿儿浑人是
伊斯兰教徒。

元末又有诬称阿儿浑人为回回人之例。如王祯《王忠文公集》
卷20《漳州路达鲁花赤合鲁温侯墓表》说：

迭理弥实，字子初，合鲁温氏，西域人也。

而同书卷14《书闽死事》（目录作《书闽中死事》）则称：

迭理弥实者字子初，回回人也。

按，迭里弥实，元典章作迭里威失，《元史》或作迭里迷失、迭儿
必失，是波斯文darwish一字的译音，义为苦修者，因此从迭里弥
实一名已可推知其为伊斯兰教徒。而他的祖父满速儿，父亲默里马
合麻，夫人回回氏，更是伊斯兰教家庭的表征。元代多称伊斯兰教
徒为回回人，迭理弥实人被称为回回人也可理解。不过这种例子
比较少见。而且是在元末才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阿儿浑人还
是称他们的氏族。也许到元朝末年才开始称他们为回回，到明朝
（王文应作于明初）则阿儿浑人大概都改称为回回人了。

这里还有个问题，即自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以来，作氏族表者
（屠寄、柯邵忞）都把合鲁温作为合鲁的另一称呼，而把合鲁作为
哈刺鲁的省文，也就是不承认合鲁温与阿鲁温是同名异称。我认
为，合鲁是哈刺鲁的省文是不错的，但合鲁温是不是合鲁加尾音

N形成的则颇有问题。因为哈刺鲁的对音是Qarluq，其收声不是元音u，不能加N；即令去q尾加N，变为Qarlun（这不可能），也只能读作哈刺仑或省作哈仑、合仑，不能读合鲁温，这和Arqu加N读作阿儿浑或阿鲁温是不一样的。

元代的阿儿浑人用伊斯兰教名的固然不少，但也有不用教名而称突厥或蒙古名的。如《元史》卷142《彻里帖木儿传》说他是阿鲁温氏，西域大族。文宗、顺帝时曾官至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和中书平章政事，是阿鲁温人中的显贵人物。但因不用伊斯兰教名，单从他本名看，就很难断定他是否伊斯兰教徒了。

三、马可波罗书中的阿儿浑人

马可波罗书中提到天德（Tenduc，今内蒙呼和浩特）州内有一种称为Argon的人，他说：

此州由基督教徒统治，我已言之；惟亦有不少之偶像教徒及摩诃末信徒。又有一种名曰Argon者，其意犹法文之Guasm-ul，换言之，混血儿，盖天德州之偶像教徒与摩诃末教徒所生者也。其人较土著人为美，技能较高，故颇有权势，且善于营商⑨。这里的Argon，应为阿儿浑的对音。除译音规律相符外，还有史料的佐证。《元史》卷122《哈散纳传》说：

哈散纳，怯烈亦氏……后管领阿儿浑军，从太祖征西域，下薛迷则干、不花刺等城。至太宗时，仍令领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

按，荨麻林，即今张家口西的洗马林，元时属兴和路；天德，辽、金时称天德军，元时称丰州，属大同路，城址在今呼和浩特东郊的白塔，马可波罗称之为天德，可见其时旧名仍存。荨麻林与丰州相距非遥，马可波罗在同章中谓自天德东行七日则抵契丹之地，沿途居民有摩诃末教徒，又提到宣德府（今宣化），可见荨麻林是在他的东行范围之内，他所见到的Argon人，当即荨麻林或其附近

的阿儿浑人，当然，也不排斥在丰州有阿儿浑人的存在。

但是，马可波罗认为阿儿浑是天德州的偶像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即他所说的摩诃末信徒）的混血儿，与我们上节论证的阿儿浑人是伊斯兰教徒的说法不同，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这一问题，经过马可波罗的注释家——如亨利玉尔、伯希和等——的探索，已经解决。一方面，阿儿浑确实有混血儿的涵义：在与我国西藏阿里地区接壤的印度拉达克（Ladak）一带尚称维吾尔人或克什米尔人与拉达克妇女结婚而生的子女为阿儿浑人（Argoon, Argand, Arqun）；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中有一arqun字，其义为“雄野马与家牝马所生之驹”，伯希和认为此字即arqun的另一种写法，并说马可波罗所理解的混血儿即是此字。另一方面，伯希和认为，阿儿浑又为一部落名称。他举许有壬所撰《哈只哈心碑》和《元史·哈散纳传》，指出阿儿浑人是伊斯兰教徒，马可波罗是在荨麻林或其西南一带听到阿儿浑人的名字，但他又知道阿尔浑在突厥语中有混血儿义，因而作出了错误的解释^⑩。

个人认为，伯希和的说法，既解释了马可波罗对阿儿浑解说的合理的一面，又指出了他的错误及致误之由，是可以接受的。马可波罗对阿儿浑的解释虽然不正确，但他指出阿儿浑人有一半是属于伊斯兰教徒的血统，总算道出了事实的一部分，可说是“未可厚非”吧。

至于有些马可波罗注释家把Argon解为也里可温（景教徒），这一方面由于马可波罗的某些版本的讹误，一方面也由于一些注释家的误解，这一点前人特别是伯希和已经指明，就不必多说了。

四、阿儿浑人的分布及人数推测

从上节所引《马可波罗书》和《元史·哈散纳》两段记载可以看出，在北方的天德州（丰州）和荨麻林一带，都有阿儿浑人的踪迹，而且人数不会太少，否则不会引起马可波罗的注意。就我们掌握的材料看来，阿儿浑人不仅在北方有，在其他行省内，也大有人

在。这和元代其他色目人的情况基本相同。

举几个著名的阿儿浑人世家的经历可以说明问题。如阿鲁浑氏的哈只哈心：他在成吉思汗西征时，经过抵抗后投降，其后拨属伊朗的伊利汗宗王旭烈兀。元世祖至元五年，他以伊朗使者的身份到大都觐见元世祖，病死在燕京。他的儿子阿散被任命为大名路税课提领；他的两个孙子——暗都刺和凯霖，前者在大都，任大都路警巡院达鲁花赤，后者任彰德路达鲁花赤，并将他的祖父母、父母及亡兄的坟墓迁到河南安阳县来，表示定居之意^⑪。又如合鲁温氏的迭里弥实，他的祖父满速儿做大都路治中，父亲默里马合麻做安庆路治中，他自己则做漳州路达鲁花赤，三代人自北而南，迭里弥实在元末死后，即葬在漳州，其子孙此后一直住在漳州，并取其子普颜帖木儿名中的“帖”字，以“帖”为姓^⑫。再如溥博，也是阿鲁温人。他的曾祖哲立理住在大都的宛平县（今北京市），祖父道吾因在杭州做官，遂在钱塘居住。他的伯兄木八刺又迁到永嘉。溥博通儒学，善文辞，中至正二十二年江浙乡试，在嘉兴教学，因定居嘉兴，并改姓浦氏^⑬。这几个例子说明，阿儿浑人最初从西域迁来，多住在北方，其后则随着元朝的建立和统一中国而向南迁徙。自然也有一些留在北方的。据元人张铉《至正金陵新志》所载，元朝后期，在金陵（今南京）做官的阿鲁温人，至少有十个，在镇江路做官的阿鲁浑或阿刺温人，据《至顺镇江志》所载，至少也有四人。

阿儿浑人分布既广，其人数自应相当可观。遗憾的是，史料太少，无从统计。《元史》中阿鲁温人有传者仅彻里帖木儿一人（卷142），可谓疏陋之至。钱大昕首创《元史氏族表》，阿儿浑有世系者只有也速兀阑一家六代六口，哈散、掌机沙祖孙二人，其他则彻里帖木儿、理熙、达理于实三人各自独立，无世系可言。至于迭里弥实一家，则钱氏另列为合鲁温氏，不承认其为阿儿浑或阿鲁浑人。《蒙兀儿史记》与《新元史》的《氏族表》，除增加哈只哈心一家四代八口外，并未再添一新资料。这一方面由于资料本身的稀

少，一方面也由于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不够，没有认真多方挖掘。最近台湾学者王德毅等编纂《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其第四册为非汉人传记索引，从正史、别集、方志、金石录等各方面搜集资料，相当完备。关于阿儿浑人物，约收三十五人，较之以往各书，所得殊多。但其中往往有一家只列一人者。如只举掌机沙而遗其祖父哈散；只举道吾而遗其祖父及六子、七孙及四重孙十八人；只举哈只哈心而遗其二子、三孙、二重孙七人。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有官职，在各地有一定地位，不应忽略。若把这些人数加进去，则有名字可考的应为六十一人。另外，我们在第二节所引的《玩斋集》卷8《双孝传》的阿儿温氏亦福的哈儿丁一家四代六人，也是“子孙世为闻臣”，而为《索引》所遗。若增此六人，则有元一代知名的阿儿浑人应为六十七人。

当然，这个数目是很不精确、很不完备、和实际数目有不小差距的。这是因为：（1），现存的元代文献极不完备，如元代的方志现存者不过几种；（2），现存的元代文献中，对于色目人并不是一一注明其族籍。方志如《至顺镇江志》和《至正金陵新志》是注族籍的（但也不普遍），其他方志则多不注族籍；（3）可能一些阿儿浑人被认为回回人。至于主观因素，当然也有关系。这一统计数字虽然极不完备，但就目前所搜集到的这六十多个人的经历及活动而论，对于元代阿儿浑人的情况已可有个大致的了解。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中，就引用了上述一些阿儿浑人华化的事例。本文对此课题不拟涉及，故不具论。

最后要说一点的是，阿儿浑人在元代虽然分布颇广，人数不少，但在明朝，除明初的一些著作尚提到此族名外，以后的记载就不见了。大概她已被称为回回人而其本名消失。这可以说明，我国的回回人或回族，是历史上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不同民族形成的。这正是我国回族构成的一个特点。

注释：

- ①箭内互：《蒙古史研究》282—284页。此据陈捷、陈清泉《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译文。按：Sartaghul，《元朝秘史》音译作“撒儿塔兀勒”，旁译“回回”。
- ②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上册273页。
- ③Une Ville Musulmane dans la Chine du Nord Sous les Mongols, 原刊1927年10—12月号《亚洲报》，此据冯承钧译文《荨麻林》，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58页。
- ④《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39页。
- ⑤冯承钧《西域地名》陆峻岭增订本36页Isfijab条及80—81页Sairam条。
- ⑥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5期74、76页。
- ⑦《西域地名》92页Talas条。
- ⑧Barthold: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Minorsky英译本1958年版第二册157页。
- ⑨此据亨利·玉尔及亨利·戈耳迭本《马可波罗游记》1929年第三版第一卷59章284页英译本重译。冯承钧译沙海昂本（源于颇节本）上册265页作“此种持有治权之基督教徒，构成一种阶级，名曰阿儿浑（Argon），”系根据一种讹误的版本，使人误认为阿儿浑人是基督教徒，因而把阿儿浑视为也里可温，不足据。张星娘译拜内戴拖本《马哥孛罗游记》121页把Argon译为也里可温，则是根据正确的版本作了错误的汉译。
- ⑩前引亨利·玉尔本289—292页；玉尔不赞成Argon为也里可

温，但由于“混血儿”的涵义联想到居住在我国陕、甘一带的东干人（Tungani, Dungen），恐不足据。伯希和的说法见其《马可波罗游记铨释》第一卷50—51页。

⑪《至正集》卷53《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

⑫《王忠文公集》卷20《漳州路达鲁花赤合鲁温侯墓表》；黄仲琴：《选里迷实墓》，载《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四期，1927年11月22日。

⑬《宋学士文集》（四部丛刊本）卷17（《塞坡集》第七）《西域浦氏定姓碑文》。

鸦片战争前的地主与农民

来新夏 焦静宜

鸦片战争前夕，正是清朝的嘉、道时期。这时，清朝已从前期的繁盛逐渐衰落下来。封建社会已经走向它的晚期。这一时期的生产关系主要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研讨和描述这一所有制下的地主与农民状况对了解鸦片战争前的社会背景和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都将有所裨益。

地 主 阶 级

鸦片战争前的满汉地主阶级以民田、官田、旗田、屯田等各色名目的占有形式霸占了大量土地，构成了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就凭借这一所有制进行兼并与剥削。

土地兼并从清朝建立后不久，政权稍见稳定时就陆续出现了霸占巨量土地的大地主，尤其是官僚地主依恃政治权势，巧取豪夺，更为显然，如康熙时高士奇、徐乾学等都是霸占土地千顷万顷的大地主^①。雍正初年实行的摊丁入亩制度即是为解决由于土地集中现象严重所产生的矛盾而必然采取的一种改革措施。乾隆朝则发展到更为严重，如人所共知的“权臣”和珅即占地八千余顷^②。从乾隆六十年所揭露福建督抚伍拉纳、浦霖受贿案的有关文献中可看到福建巡抚浦霖的占田数是：

①《东华续录》康熙四四

②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三

项 目	亩 数	价 银	价 钱
自名置田	2,700 (亩)	6,713 (两)	36,038,000 (文)
家人陆升出名	50.2 (亩)		836,000 (文)
女婿钱洪绪之仆 盛忠经手由钱 姓出名置田	318 (亩)	1,882 (两)	4,369,000 (文)
亲戚骆侣梅自 首交出匿田	157 (亩)		2,000,000 (文)
总 计	3,225.2 (亩)	8,595 (两)	43,243,000 (文)
清 单 总 数	3,226.47(亩)	8,595.9 (两)	43,245,465 (文)

(资料来源:《史料旬刊》第32期)

另一个案犯福建布政使伊辙布的占田数是:

占 地 地 区	地 亩 数
典买涿州等处地	27 (顷) 73 (亩)
关 东 地	160 (日)
古北口外沈家屯	6 (顷) 71 (亩) 76 (段)
涿州香河老圈地	3 (顷) 34 (亩)

(资料来源:《史料旬刊》第31期)

其实早在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在其《陈明米贵之由疏》中就指出:

“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随着土地日益集中,地价也日增,同疏中又说:

“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至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至二十余两。”

这种兼并的结果，必然是：

“贫而后卖，既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已买不可复卖。”①

嘉庆十年广东巡抚百龄获罪被查抄财产时，也发现拥有大量土地，致使嘉庆帝也难以置信而在上谕中指称：

“且披阅单内有买房六处，买地五千余顷，为价不少。伊本年出京时，曾闻其称盘费不敷，向人挪借银两，竟似清贫有素，而见在查出所置产业有此，其平日所为，恐未足深信”②。

不仅官僚地主如此，庶民地主也动辄拥千万亩之巨。嘉庆时，湖南衡阳刘姓地主“田至万亩”③。道光时，江苏吴江县地主沈懋德“有田万余亩”④。直隶沧州齐家坞袁姓地主“占田二千顷”⑤。

以上可见土地的高度集中已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其愈益严重的发展趋势表现着封建社会晚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之一。

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以种种手段迫使农民阶级脱离土地，从而促使着鸦片战争前地主与农民阶级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过程。

地主阶级凭借着土地所有制的实力，对农民阶级进行着封建性的剥削与榨取。封建剥削的主要手段是勒收地租。不过，当农民尚未套上地租枷锁之前，往往还要先付出一定代价来换取遭受剥削的“权力”，那就是在佃租土地时需要先缴纳所谓“顶费”与“押租”。

“顶费”是农民向地主取得佃种权的一种化销，一般用货币。它的

①《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

②《东华续录》嘉庆二〇

③彭玉麟：《衡阳县志》卷一一

④熊其英：《（光绪）吴江县志》卷一九

⑤李象麟：《棣怀堂随笔》